



贵州

文学现状与构想

● 徐新建 潘年英 钱荫愉 黄晓玲 张建建 何光渝 陈跃红

·973

文学理论入门



1957

责任编辑 夏 凡
夏文琦
技术设计 杨林棚
封面设计 唐映松

贵州文学现状与构想

(出头鸟丛书)

徐新建 等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九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95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 7-221-00848-5/I·150 定价2.60元



序

徐新建

千万年以前，文化出现了——带着地域的特色；千万年以前，文艺起源了——带着原始的功能。远古先民迈着艰难的脚步，沿着历史长河向现代走来；现代的后辈们则借助神奇的想象，使消失在记忆深处的史迹复苏、再现并朝着若离若即的未来靠拢。

我们的世界便在这种三元的对话中逐渐呈现着自己的面貌。“我们”就是人类；“人类”就是这三元对话的中心。当我们提到“世界”（WORLD）这名词的时候，意味着对一个以地球上的人类为价值中心的完整宇宙的承认，当我们进一步提到“现代世界”时，又象征着对存在于地球各个角落的人类文化的共性认同。在这里，一切个人、家族、部落、民族、国家等等相互分割的划分皆已成为陈旧的过去。在这里，“人类”（HUMANBING），一词标志着一切文化的核心所在，突出着人的存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

然而，统一完整的“人类世界”（至少在观念上如此），既结束了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封闭、相互割裂的古老格局，同时却又在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多样进程中促进了个性的强化和群体的再次聚合。于是现代的人类文化，出现了统一背景下的多元并存、多样竞争。

艺术的发展大致也是这样：文化——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框架囊括了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艺术唯有纳入其中才能

辨认自己的位置与价值；反过来，只有在各种具体性的艺术存在等要素的基础上，文化才得以成为现实。

这是我们的观照和反思前提。我们愿在统一的“人类世界”背景而不仅是“中国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圈子中研究我们的对象；我们更愿在宏观的“文化框架”内考察作为一种地域性存在的文学艺术。

贵州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构成部分之一，应引出众多的审视角度，无论是从文学看文化还是从文化看文学，或从贵州看世界还是从世界看贵州，都是如此。贵州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存在，还应被看作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流动过程。从地域上看，它有着特有的“生态环境”；从年代上看，它与这片土地上的古今成员有着悠久的传承关系；从色彩上看，它有着众多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因此，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也应当具有与之相应的气派和深度。

不过，面对东西方文化不断冲击、不断融合的现代趋势，站在人类艺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对贵州文学的现状表示不满，并在不满的冲动下碰撞出若干理性构想，尽管这些构想带有先天性的缺陷（理论的匮乏），但却真正希望能够由此激起反思的火花，使开始变得寂寞的贵州文坛增添些生气。

如果说艺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创造才能的进化，那么今日这种艺术实践、艺术批评与艺术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便意味着文化的解放——尽管其同时伴随着分工带来的各种“异化”现象。艺术批评能够阐释、延长并扬弃实践，其自身则

有赖于艺术理论的系统构成。与艺术实践一样，艺术批评也面对着现实世界本身，其动力同样来自于主体对世界的感受。不同的是，一个从感受出发，把现实世界再现（表现）为充满意味的形象；一个也从感受出发，却把这些形象升华为观念的人生哲理；二者是同一地平线上的两种艺术把握，两种人生方式。

艺术理论似乎要特殊些。在我们这古老的国度，其一向被认为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顶多只能依附于各种“治国平天下”的诚条之术。这既是不幸亦是谬误。就艺术的三种构成而言，在远古时代，那些神奇美妙的艺术形象本身已是原始先民所表达出的一种理论；那些神话、史诗、歌舞、壁画……本身就是完整的哲学、宗教、美学、史学，只不过尚未被总结、被翻译为另一种逻辑形式的语言符号罢了。

今天对理论的忽视就有点说不过去。古代的艺术理性精华由于缺少完整的逻辑符号而难以传承了，而我们现代艺术的不断失误则恰恰因缺少理性的反思而一再恶性循环。明眼人皆能见出肉中的毛病所在：一方面我们似乎并不缺少理论，一方面我们的理论似乎不起作用。

问题的关键乃是：历史需借理论不断刷新；理论则需靠历史不断扬弃。我们的艺术理论是应当扬弃了——面对现实，更新自己——否则，陈旧的艺术理论不可能被要求更新的艺术实践所接受，用之指导艺术批评，只会强化固有的谬误。

理论与实践，存在着心理和情感上的距离，但彼此难分孰先孰后。不过若以陈旧的实践强求更新的理论就范，或相反，便会突出二者的距离。在现实世界发生较大变化的时代，这

种距离的突出似乎在所难免。对于已习惯于旧有理论规范的艺术实践来说，任何“出轨”的理性反思、理性批评都显得过于生硬、空泛乃至片面、武断。公正的判官，不在实践，亦不在理论，在于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之艺术需求。

到底有没有一个“贵州文学”？这问题的另一意思是：“贵州文学”的内涵是什么？

这相当于问：有没有“贵州文化”？若有，其是指A：贵州人拥有的文化；还是B：贵州人创造的文化；亦或是C：具有贵州特色的文化？如此分析，答案似乎倾向于A或B，因为C本身又将引出更难回答的疑问：什么是贵州特色？

但把这问答主词转换为“贵州文学”，却只能倾向于回答B或C。因为若是A，则可能包罗了整个“世界文学”，尤其在不断对外开放的今天，更是如此（世界文学是伴随着世界文化市场的形成而出现的）。在此，我们所指的“贵州文学”是一个地域与文化的结合体。

“贵州”作为具有现代行政边界的地方省区，其历史不过几百年，但作为一个连续的文化过程，其却与远古先民社会乃至原始部落遥遥相连。由于不是总结纪录性的史料堆砌，而是现状基础上的理论构想，我们的注意点集中于现代。注意现代，脱离不了历史，却更是为了未来。如果这样进行粗略分段的话，贵州的现代文学即是指二十世纪的贵州文学。“二十世纪”是整个中国文化发生剧烈变动的世纪，它为贵州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极富动感的冲击力。而在剧烈变化中保持某种恒定地域特色的“贵州”，又为这文学的“地域性”规定了文化的具体氛围。此二者的交互作用，

使得现代贵州的作家们或隐或显，或多或少总是保持着一种双重的文化特质：对地域文化的批判性认同。认同，使其获得生存的权利和心灵的归宿；而批判则使其得以在现代化冲击波中反省自我、发展自我、扬弃自我，避免被固有的地域文化彻底困死，从而失掉“走向世界”的最后希望。因此对这种双重特质的自我意识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清醒还是盲目，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家的文学成就。

基于上述这些，我们不仅要考察贵州文学现状中的种种表象，还力图探测影响其内在走向的深层机制，也就是说，想从文学的范畴稍扩展出去一些，探向作家的社会构成、读者的需求取向、以至于文化的心理结构，等等。

艺术批评不是光荣榜，不是为作家们评功摆好；也不是布告栏，专搞批判斗争。批评是一种选择，一种阐释，更是一种创造。面对发展变化中的贵州文学，我们通过批评，从一定的理论框架出发——这些框架本身乃是一种假定，一种创造，每每亦互不相同——使之呈现出带有批评主体印迹的某种轮廓和条理。或许，还将带出批评者们各自的主观评价。这评价又不可避免地要成为顾此失彼的一面之辞。但现实的贵州文学也正是通过若干种一面之辞，才可能以理性观念的形态第二次呈现于世，从而获得另一次有趣的生命。

作家们应把这视为一种特殊的读者反馈。而我们则以为这是理论创造的一种具体呈现形式。

于是，我们的分析和评论便不可能（也不应当）仅只是跟在艺术实践后面的人云亦云，或照葫芦画瓢。相反，我们倒可能在这组有机而独立的文章中谈点实践，谈点理论；谈

点文学，再谈点文化；谈点现实，再谈点历史和未来；谈点省内，也谈点省外、国外；谈点汉族，再谈点其他兄弟民族；谈点文人文学，也谈点民间大众文学；谈点男性文学，再谈点女性文学；谈点文学母题、意象，再谈点结构、功能；谈点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再谈点现实审美上的不足；谈点我们的不满，最后，再谈点但愿是有益的期望……

我们是一群还站在文学边缘的中青年人。我们的这组文章仅是一次尝试性讨论，谈了半天，说不定全是门外傻话。对于它的优劣成败，听凭读者无情批评，只盼能通过读者们的批评，引出更为深刻的研究和探索，以促进我们文学的繁荣。

——写于1986年

目 录

序.....	徐新建 (1)
--------	---------

第一章 方法与层次.....	徐新建 (1)
----------------	---------

- 一、二向拓展：在文学与非文学的互动之间..... (1)
- 二、二级演绎：缺乏终极根据的文学批判..... (16)
- 三、二重心态：矛盾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现代困惑..... (32)

第二章 民族与文学.....	潘年英 (58)
----------------	----------

- 一、民族·民俗·民间..... (58)
- 二、文字·文化·文学..... (72)

第三章 叙事与意义.....	张健建 (97)
----------------	----------

- 一、情绪话语在文本中的发生学形态..... (98)
- 二、情节模式及其文化意义..... (112)
- 三、事象还原与中断叙述..... (127)

第四章 妇女与文学.....	钱荫愉 (142)
----------------	-----------

- 一、文学的失落 理论的困惑..... (142)
- 二、地域意识 性别意识..... (147)
- 三、一个“伪文化”框架..... (154)
- 四、找回丢失得太久的课题..... (161)
- 五、接受意识对创作意识的干扰..... (163)

第五章 大众与文学·····	黄晓玲 (177)
一、通俗文学的界定·····	(177)
二、贵州通俗文学例释·····	(182)
三、当代生活与文学功能·····	(200)
四、娱乐文学入流·····	(205)
第六章 寻求与超越·····	何光渝 (214)
一、现实：所作所为与所想所梦的融合·····	(217)
二、创新：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结晶·····	(232)
三、展望：贵州文学走向现代的沉思·····	(250)
第七章 乡土与史诗·····	陈跃红 (261)
一、地域文化与乡土文学·····	(261)
二、乡土乎？乡村乎？·····	(266)
三、呼唤现代乡土史诗·····	(271)

第一章 方法与层次

——贵州文学的三种进入方式

徐新建

一、二向拓展：在文学与非文学的互动之间

文学研究在经历了较为单纯的社会学、政治学、文体学等阶段之后，出现了在更为开扩、更为综合的文化学范围内加以全面透视的新趋势。这里，我们将贵州文化作为研究贵州文学的宏观背景。当然，在其之外，还有更大的隐含系统——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

贵州文化从表层特征看，有其显著的特征，诸如“地方性”（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省）、“民族性”（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杂居）、“多样性”（以经济技术相对落后为标志的文化形态多样并存），等等。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一种“形象的反映”），贵州文学有机地体现了这些特征，其自身亦呈现出颇为丰富的横向组合及纵向进程。因此由“贵州文学”所引出的研究自然便能因需要与方法的不同，而作出五彩缤纷的论述。本章仅强调其三个颇有意思的方面，即“内与外”、“文学与文化”和“结构与功能”。因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分析前提，故不过多进行价值评诂而着重阐述形态性特征。

(一) 内 与 外

人 称 视 角

“贵州文学”作为整体，可以有由内及外和由外及内两种互补的审视角度。前者相当于文学描叙中的第一人称（我、我们）；后者相当于第三人称（他、他们）。虽指同一对象，两种人称视角的差别却很大。

第三人称（他、他们）以中国文学为背景，使“贵州文学”成为远离京都的边塞文学，其特点便在于异土风光、异乡情调，在于与时代潮流若即若离的边远、古朴。正如被历代正统文学史书所不断载入的“边塞诗派”一样，“他、他们”为以京都文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学增添了新鲜的特质。这种审视角度的前提首先是对中国文化某一历史阶段的“政治中心”的认同，其次是对与之相应的“时代主潮”的主动呼应。当年蹇先艾的作品之被鲁迅先生界定为“乡土文学”，便是这种认同与呼应的典型例子之一。当代作家叶辛，若从其以“上海知青”身分“蹉跎”到贵州山区这面来看，其作品亦同样堪称“边塞文学”。此源头一直可上溯到清代实行“改土归流”前后众多的朝廷命官以各自的诗文、游记、杂录等所带来的文学传播及其影响。

但同样作为一个整体，若换上第一人称视角，则又可以把“贵州文学”变为我、我们。于是便会出现另一番景象了。“我、我们”上接本土文化的远古史诗、神话，今日文学不过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特定变体而已。随着文化

交流、融合和文学自身发展的继续深化，“我、我们”的形态还将不断变化下去，但只要贵州文化尚未解体，所有这些变体都仍然是其中的有机部分。

可见，贵州文学既是边塞文学，也是本土文学。因此既需要参照贵州文化的地域坐标，亦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宏观背景。也许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蹇先艾式的“乡土文学”与何士光、李宽定式的“黔北文学”之异同，以及郑珍式的“边塞文学”与叶辛式的“知青文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并且还可在中国文学统一构成的框架中考察延续至今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现象，进而有助于在多种比较中把握各自的特殊地位及其价值。

民族构成

与“五四”以来分析中国文化时往往不重视其内涵的民族差异相似，当代的文学研究实际上也忽略了中国文学总概念中的民族成分。大凡提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或“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类的命题时，其通常主要指中国的汉民族文学。这是不该忽视的失误。它意味着封建传统所遗传下来的“大汉族中心”在文学研究上的延伸，其结果是造成了我们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长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视而不见，同时又在总结中国的文艺理论时，仅以汉民族文学为对象，提出了某些并不符合实际的文艺观点。比如，在进行所谓中西文学比较时，由于这种失误，总结出“再现与表现”、“主动与主静”、“典型与意象”、等不甚全面的结论。这些结论用于解释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北方、南方、古代、现代）都显得过于简单和牵强。

贵州乃多民族地区，除汉民族外，其他少数民族也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文学活动。从民族构成上，我们可将它们分为贵州汉族文学、贵州苗族文学、贵州布依族文学、贵州侗族文学、贵州水族文学等等。从这思路看，又引出另一意义上的“内与外”的问题。为了不至于使这种多民族文学并存现象变为支离破碎的杂乱组合，我们还需要借助于文化与地理方面的理论框架。

从人文地理的历史沿革看，贵州的汉民族文化属于一种“移民文化”，从而贵州的汉民族文学亦可称为“移民文学”。这时我们的参照坐标是在其之前便已存在的本土文化和本土文学——史诗、神话、故事。有了这样的历史眼光，我们便能顺当地找到从古代到现代贵州汉民族文学的发展线索，并顺着这线索理出从蹇先艾到石果，到何士光、李宽定、李发模、叶辛，再到赵剑平、姚晓英、周西篱等人的相对位置。

有了这样的基础，如果我们进一步承认贵州的现代文学在统一的中国文学背景下，已出现以汉民族文学为主体的历史趋势，那么就能在冷静指出其与其他省区文学的相对差距的同时，深刻理解其历史性成就。

从文化意义看，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价值远未得到充分认识和挖掘。与汉民族文学相比，可以说，它们不仅在文学本身，而且在美学、哲学、宗教等若干方面皆可说属不同的系统，彼此的功能和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不可用固有的汉文化模式加以扭曲或剪裁。比如，在现代汉民族逐渐以“小说”作为其文学的主要样式的同时，贵州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则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诗歌样式。二

者在符号、功能等方面皆有着显著的差别，不可简单地以其中某样式为标准，否定或贬低另一样式；相反，倘若对此类差异加以认真比较分析，说不定还能促进我们对文学的全面理解，促进现代文论的完善，进而又在不断完善的现代文论基础上，加深对贵州文学的总体把握和评价。

作者身分

职业作家是文学活动的一种社会分工产物，却不是文学活动的唯一标志。研究文学应当把视野从狭小的作家圈子中拓展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贵州文学可分为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两大部类。

文人文学向来颇受关注。这大概是由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通常都由文人所作的缘故。然而久而久之似乎又形成了文人文学就是整个文学的“主体”甚至于“全部”之类的观念，从而影响了对文人文学之外的民间文学的重视和关怀。正因为这样，一般来说，我们对文人文学谈得较多、较细，涉及的面也较广，收集的资料也较为丰富，研究起来似乎也要容易一些，而对民间文学则陌生得多。

贵州的文人文学主要指由少数职业作家和半职业作家，通过正式出版物发表作品的文学现象。其中包括汉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不过后者较为特殊，其多为具有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分同时又采用汉民族文字作为自己的创作载体的“双重人物”，值得深入研究。贵州民间文学与此不同，其主要以存于各民族生活中的口头文学为代表。如前所述，由于以往文学观念的偏狭，这部分丰富的文学内容，长期未能进入“贵州文学”的正统框架，乃至于无形中产生了与文人

文学之间的一道鸿沟，双方缺乏对话、缺乏沟通、缺乏交流。如今，倘若把民间文学引入我们的框架之内，也许将是对传统文学观念同时也是对正统的文人文学的一次挑战。

此外，贵州民间文学之中还有另一被忽视了的 重要部分，即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部门的业余创作活动及其体裁丰富的多种文学作品。它们包括大专院校文学社团自办的油印刊物，机关、厂矿、部队定期或不定期的文学墙报、文艺会演（诗歌、剧本）等。对这部分民间文学进行分析研究，理应属于“专业”批评家们义不容辞的职业范围。可以想象，只要经过认真而系统的考察，其中所包括的大量文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丰富内容一定能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贵州的文学面貌和贵州的文化面貌。人文

通过人称视角、民族构成以及作者身分这样一些角度，我们获得了认识贵州文学之“内与外”的初步框架。它远未完整，却是朝完整迈进的一种努力。

（二）文学与文化

从文学看文化

当我们把文学当做独立的审视对象时，角度的转化就成了极有意义的事情。若站在文学之内，以文学特有的方法、尺度和术语进行观察并将观察之结果加以表述，便很自然地归顺于美学研究的长河之中；而若是走出文学圈子，站在文学之外，用别的眼光和尺度观察文学，则可能获得更为广阔多样的发现。在我们看来，就作品而言，其一旦离开作者便